

中国智慧在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只有人的身心内外都渗透了这种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王道

内圣外王的中国智慧

冷成金 著

王道

内圣外王的
中国智慧

冷成金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道：内圣外王的中国智慧 / 冷成金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15.9

ISBN 978-7-229-09976-3

I. ①王… II. ①冷…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13156号

王道：内圣外王的中国智慧

WANGDAO NEISHENGWAIWANG DE ZHONGGUO ZHIHUI

冷成金 著

出版人：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陈建军

策划编辑：欧阳勇富

责任编辑：陈 丽

责任印制：杨 宁

封面设计：小何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c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23 字数：341千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自序 传统文化的精，中国智慧的魂

历史是什么？历史不是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也不是强权暴力、阴谋诡计，历史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大智慧，谁掌握了这种文化和大智慧，谁就掌握了历史！

据说，中国人天生都是政治家，政治的运作方式又是“人治”，所以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就成了“治人”。于是，人人也都似乎成了谋略家，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之类的话就说透了这个意思。许多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谋划、算计别人上，不仅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内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谋划和算计似乎已上升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它已经不是一种“术”，而是中国人的人生之“道”，是中国人内在的处世哲学和难以改变的文化精神。

然而，智谋的根源是文化，智慧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如果智谋仅仅是一种方法、一种技术，那么，帝王之学人人可讲，只要照本宣科，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君临天下？

权谋，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中国的智慧在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只有人的身心内外都渗透了这种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谋谋圣、外谋谋智的境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圣、智兼备的谋略家。

人，不是权谋的动物，却是文化的动物。没有文化素质的人，玩弄权术只会玩火自焚；而只要达到了“内圣”的境界，不用刻意玩弄权谋，也会做出利人利己的“外王”的业绩来。

因此，中国的智慧是学不来的，要用生命来体味！只有熔铸了自己整个的情感与生命，才能得到中国智慧活的灵魂，才能用中国智慧建立起自己高大的人格和杰出的功业！

被历史抛弃的往往是那些没有文化理想的“神算子”、“智多星”、“奸雄”、“枭雄”，而传统文化的精华却是长河之水，奔流不息，不断地淘汰着历史的沉渣。这正应该是我们面对历史长河时的澄明心境，也应该是我们读史的大智慧。

如果说道家智谋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最聪明的一页，法家智谋是其中最刻毒的一页，兵家智谋是其中最冷峻的一页，纵横家智谋是其中最无耻的一页，阴阳家智谋是其中最神秘的一页，那么，儒家智谋就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至为深刻的一页，是真正的大智谋。

儒家智谋一向与王道理想相联系，是非常深奥复杂的，我们这里所要讲的只是选取其智谋性的一面，即王道理想如何转化为智谋和儒家智谋仁术治国的特点。

孔子曾经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他的意思是说，处理诉讼案件，我和一般的人一样，也要按照法律办事的。但我和一般的人不同的地方在于我要首先实行礼乐教化，从根本上杜绝诉讼案件的发生。这是孔子以礼乐治国思想的基本表述，如果能和司马迁的另一句话相参照，也许会对孔子的这句话有更深刻的认识。司马迁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意思是说，礼乐教化对于治国治民来讲是更根本的，而法律往往只是起个“马后炮”的作用。

中国有关治国治民的智谋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治标的和治本的。显然，儒家是“治本”的代表学派，而法家是“治标”的代表学派。

儒家自身似乎是反对在治国治民上使用智谋的，起码没有公开提倡过，但实际上在整个中国文化与其智谋型的整体特点中，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智谋，它的各个方面都在智谋文化中找到了各自的定位。

简要地说，儒家的王道理想所考虑的不是个体的人的利益，而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王道理想是要首先指向社会的利

益的，但社会的利益又必须牺牲个体的人的利益。这样看来，在王道理想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个体的人与社会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利害关系。因此，儒家的王道理想在考虑具体的策略时必然要想方设法地趋利避害，实际上也就转化成了智谋。

如果从价值观念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中国人没有超越外在的价值观念，王道理想的价值观念的出发点就在于现实社会，通俗一点说，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实现了多少现实功业，就是实现了多少人生价值。由于儒家个人的价值自足定位在现实的世俗功利之中，所以，无论儒家怎样高唱道德的神圣和超越，它最终还是把这些道德神圣还原为世俗的现实功利，而这些道德神圣和现实功利从根本上来讲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他们所向往的都是利，在形态上的区别则是大利和小利。由于大、小利益的悬殊太大，人们往往看不到道德的功利色彩，往往把它误认为是超功利的。

如此一来，儒家所着重强调的义利之辨，实际上就变成了道德神圣和现实利害如何转化的问题，而处理这一转化，儒家比其他各个学派更高明，更具有合理性。

这种高明就在于儒家智谋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它的运谋方法不是谋智，即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用强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王道理想献身。

如果用今天的现实来阐释当年儒家的智谋的话，那就是儒家并不首先向人们宣扬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迫使人们执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把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之中。由于儒家的王道理想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温情脉脉的，所以它也就最富有感动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别人所谋，被一种观念所谋，他也是心甘情愿的。但这已经不是因为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因为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说明儒家的智谋在其最深处是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则的。这就是儒

家智谋的合理性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儒家智谋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仁术，仁术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术的核心当然在于以仁治国治民，但如何才能实现治国治民呢？法家和兵家用强力来压服人心，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儒家则主张用个人的人格修养来影响别人，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通过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改变整个社会。二者的出发点和走向都恰恰相反。这样，儒家就把个人的修养看成是实现王道理想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修、齐、治、平四项当中，修是放在第一位的。以修身为中心，逐渐向更大的社会范围衍射，从理论上讲，衍射的幅度——也就是一个人所取得的现实功业的大小——完全是由个人的修养水平所决定的。

在这里，儒家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无比诱人的蓝图：没有等级的差别，没有门第的限制，没有权力的干扰，总之，一切外在的束缚统统被取消了，只有人的内在世界才是真实的，只要肯提高自己的修养，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的确，儒家学说为人的发展在理论上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和美好的发展前景。这就是儒家智谋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大智谋为中华民族所钟爱的内在原因。

在具体的治国治民的策略上，儒家首先讲究的是使人心服。下面引述几段先贤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使人心服的具体方法很多，儒家在运作这种智谋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很完备的理论系统和实践经验，在这里无法一一尽述，

但总的说来，官吏要设身处地为百姓的利益着想，为大局着想，为道义着想，要舍己为人，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牺牲个人的生命。

在后来的儒学大师中，有许多人在为帝王出谋划策时直言不讳地大谈儒家思想对治国、牧民、驯臣、王天下的重大利害，虽然他们已经明确地把儒学当作智谋来对待了，但其中一以贯之的合理因素并没有完全消失，就是在今天，这种智谋恐怕也不是完全过时的。

儒家智谋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大智谋，实在是一种取之不尽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即使有人看不到这些，至少，那种对智谋就是欺诈、就是阴险、就是卑鄙的庸俗理解也应该有所改变吧！

冷成金

目 录

自序 传统文化的精，中国智慧的魂 / 1

01 书生难做开国皇帝

开国与固权，帝王第一义也 / 2

书生难做开国皇帝 / 13

有礼，方知天子之贵 / 23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 26

称霸于多事之秋 / 30

柔道治国：军中武将多好儒 / 39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 45

无情帝王家，皇帝都是苦命人 / 60

02 内圣外王：最理想的人生模式

廉颇老矣，那碗饭该不该吃 / 66

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 / 69

良臣忠国是一个历史命题 / 78

忠奸不明，谋国易谋家难 / 87

忠君未必是爱国 / 98

以顺为正，非妾妇之道 / 107

勇往直前，也要进退有道 / 109

慈忍之道，颠扑不破的赤裸人性 / 113

内圣外王：最理想的人生模式 / 126

03 庄严的政治，有时也需要务虚

尊严感，即存在感 / 136

仁者以武制人，以德服人 / 146

从谏如流，人格修养需到达极高境界 / 153

包办一切：奴隶的安乐窝 / 160

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 / 163

如其仁，如其仁 / 169

庄严的政治，有时也需要务虚 / 181

04 走马灯，以臣代君

妓院与宫廷，最不讲道德 / 186

历史管身前事，也管身后名 / 191

走马灯，以臣代君 / 199

商业改变的不仅仅是政治 / 204

两个不倒翁，一部活教材 / 212

外人不好当，不好说，不好做 / 220

迂回进言，选对利益关联者 / 223

05 人心是一篇大文章

人心是一篇大文章 / 226

蜀中无大将，英雄泪满襟 / 232

不得其人，不逢其人 / 234

先量才，而后取其运 / 240

用则满目俊才，弃则遍地粪土 / 247

对贤明的人，不可随便开玩笑 / 250

说客的作用，实在不容忽视 / 254

即使是帮闲，也要有帮闲的本领 / 259

06 国家不幸，诗人幸

瞧，文人那副德性 / 262

宁愿当官，绝不愿当英雄 / 272

又是隐士，还得大名鼎鼎 / 279

诗意的战争听听可以，学是学不得的 / 282

功成不受赏，士人也 / 286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 / 290

极高明而道中庸 / 296

国家不幸，诗人幸 / 307

07 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遵前制，而不令有失 / 312

雅量有道，四邻守之 / 315

君子所虑大而远，小人所虑小而近 / 318

无为：有所为，有所不为 / 320

各司其职，不必事必躬亲 / 322

成全小事，不如废弃大事 / 325

节奏！把握节奏！善于把握节奏 / 330

背水一战，有时是厉害到家的陷阱 / 338

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 342



01 | 书生难做开国皇帝

开国与固权，帝王第一义也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国人其实非常解放，无不敢想，无不敢干。西方许多国家的王室维持了四五百年甚至一两千年，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生来就容易做开天辟地的梦，有些人还真的心想事成，否则，中国历史上哪来的那么多朝代呢？

然而，开国要有“道”。若回过头来看看，就会发现权力的转换有这样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始作俑者未必成功，后继者才能完成大业。

中国历史上，陈胜、吴广首倡起义，但来势虽猛，却很快被秦军镇压下去，陈胜、吴广也随之身亡。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旋风里，项羽、刘邦分别拉起了各自的队伍，于抗击秦军的过程当中“壮大了人民队伍”，最后推翻了秦朝。后来楚汉相争，刘邦战胜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军把王莽的大军打得一败涂地，但最后成功的不是首倡起义的王匡、王凤和樊崇等人，而是随之起义的汉室宗亲、南阳豪强地主刘秀。刘秀后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攻灭了义军，重建了汉朝，史称东汉。在反隋的农民大起义中，翟让、李密领导了瓦岗军，窦建德曾建大夏国，杜伏威等人也领导了一支强大的起义军。这三支起义军都未得到天下，倒是后来反隋的关陇贵族李渊、李世民父子既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又推倒隋朝，建立了唐朝。元朝开国也是如此，成吉思汗虽具雄才大略，也只是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称为大汗，到了其子孙的手里，才灭金国和南宋，统一了中国。明朝的建立跟汉朝、唐朝的建立极

其相似。韩山童、刘福通首举义旗，创建红巾军，声势浩大，元朝为之震动，但红巾军不久便败亡了，倒是其部下朱元璋率领义军一部渡过难关，获得了发展，既推翻了元朝，又打败了陈友谅领导的另一支义军，最后建立明朝。清朝的建立跟元朝十分相似，清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也像成吉思汗一样，只是统一了各个部落，他虽称清太祖，实未统一全国，真正的清朝的开创者，是他的后代。

如此算来，中国古代竟有一大半王朝是以这种方式建立的。为什么开创者很难成功，而后继者却易于成功呢？其实，这并非上天不公，而是改朝换代的一种规律。其原因很简单。一，开创者往往只能对旧的王朝作猛烈的一击，大多不能持久，起义队伍要经过一个分化重组的过程。二，开创者往往不是能够做政治家的人，只能振臂一呼，逞血气之勇，缺少一个淘汰选择的过程，因缺少经验，所以易于败亡。三，后继者有三条优势：其一是旧的王朝已受重创，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易于将其击垮；其二是后继者继承了前人的经验，不必再走弯路；其三是后继的领导者多是从艰苦的斗争中磨炼汰选而来，具备了做政治家的品格。有此三条优势，也就易于取得成功了。

取得王权，开国帝王要做的第一件事和最主要的事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固权。所以，固权乃开国帝王第一义也。

开国皇帝何以比其他后继皇帝更需固权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开国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混进开国队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将来会酿成大祸；其二是开国期间有许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诛杀，则功高震主、才大压主和权大欺主三位一体，将来必成后患。

至于第三点，则要计之长远，为子孙谋划了。关于这一点，朱元璋的“棘杖”之喻可谓意味深长。史载，朱元璋要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进谏说：“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朱元璋听了，默无一语。第二天，他又把太子叫来，将一根长满刺的荆杖扔在地下，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为难之色，朱元璋笑道：“我让你拿着棘杖，你认为棘杖上有刺，怕伤了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

以不必担忧了。我现在诛戮功臣，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谁知太子却是一位饱读圣贤书的书生，听了父亲这话，大不以为然，反而叩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话明摆着说朱元璋是一个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大怒，当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击打太子。幸亏太子在惊慌中抛出负子图，使朱元璋忆起了与马皇后背负太子同陈友谅作战的艰难岁月，太子才免遭杀戮。

在中国历史上，为巩固权力而杀人最多的开国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了。朱元璋兴胡党和蓝党大狱，杀人数万，开国功臣被诛戮殆尽，确实避免了异姓王的造反，但他费尽心机，却无法避免骨肉相残。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终于夺了建文帝的权，对亲族诛戮之残酷，可谓史无前例。

历史不是一匹驯服的马。像朱元璋那样彻底地杀掉功臣，很难将皇位维持长久；像东汉光武帝刘秀那样“以柔治国”，未杀一个开国功臣，而是与之结为姻亲，但裙带的柔情终于抵挡不住旺盛的权欲，还是招致了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巨大弊端。那么舍其两极，取其中间，采取又打又拉，拉、打结合的办法是否可以呢？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也有做过不少这样尝试的，似乎也不太成功，怎样才能避免杀戮和混乱呢？难道历史就是用鲜血和权力的“棘杖”组成的吗？

孟子说：“不嗜杀者能一之。”其意是说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这一信条，在历史上实现了多少呢？

明朝初立之时，朱元璋确实是宵衣旰食，每天忙到深夜，早上又早早起床，接见大臣，批阅奏章，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衣食起居也十分俭朴。尽管如此，在战争中崛起的新的地主、官僚还是用各种方法营私舞弊，盘剥农民，一些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功臣旧将也恃功自傲、恃权自专，或是徇私枉法，或是巧取豪夺，刚刚缓和的农民矛盾又趋尖锐，许多地方竟爆发了小股农民起义，再加上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在不断骚扰，东南沿海一带又有倭寇出没，刚刚建立的明朝处于内忧外困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固权措施。

第一，改革官制。

削弱了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权力，把这两个主管行政和军事的要害部门分成几块，又把亲王派往各地监军，这样，大权就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中了。

第二，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施行严刑峻法。

都察院的权力是纠察百官的得失。监察御史的官品虽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构陷、扰乱视听，以及贪赃枉法、变乱祖制和不正的学术风气等都在纠劾的范围之内。

《明律》中的许多规定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十分残酷的，例如：凡奸邪进谗言使未犯死罪而致死的人，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有人用巧言进谏，使之免于死罪的，进言者也要被处斩；即使是掌管刑律的官员，如果听从了上司的主使，减轻或是加重了罪犯的刑罚，也要被处死，并将其妻子充作官奴，家产没入官府。对于贪污，朱元璋的认识十分深刻，认为这直接关系到政治风气乃至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说：“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认为此弊不除，欲行善政，绝无可能。于是，《明律》规定，官吏必须廉洁奉公，即使因公出差乘坐公车，也不能捎带私人财物，附载衣服等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打十鞭，十斤加一等，直至笞至六十鞭。凡贪污者，至轻之罪也要发配到北方边地，如果贪污数额折价超过六十两银子以上，处以枭首、剥皮、实草之刑。其具体的做法是把犯官先砍去头，然后再剥下皮，把头挂在杆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放在衙门口旁边的土地庙外，或是摆在公座之旁，其用意是警告后来的官吏，不得再行贪污。朱元璋的这一招虽不太人道，却十分有效，法令实行不久，吏治果然有所好转。

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官吏胆敢以身试法，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与户部侍郎郭桓勾结贪污，朱元璋迅速查勘，追出赃粮七百万石。朱元璋大怒，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处死。经过拷打，又牵连了许多人，最后杀人总数，包括官吏和地主竟达数万人之多。在这种严刑峻法和“运动”打击结合的综合治理

下，洪武年间的吏治总算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第三，对官吏实行特务统治。

朱元璋设立了巡检司和锦衣卫，让巡检司专门负责盘查全国各地的过往行人，人们被限制在方圆一百里的活动范围之内，如有超出，须事先弄得“路引”，这是防止人民串联造反的重要措施；锦衣卫则是专门负责监视百官的动静的，就连街衢之上，也满布锦衣卫。这样，吏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皇帝的耳目。一次，博士钱宰罢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未‘嫌’你啊，改作‘忧’字怎么样？”钱宰一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连忙跪下叩头。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而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惹出大祸。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的，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一天，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吗？”那老人拱手答道：“我吴琳便是。”朱元璋得到了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大学士宋濂是著名的学者，对朱元璋可谓赤胆忠心，但朱元璋还不放心，经常派特务监视。一天，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交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何故生气，宋讷做了解释，朱元璋知道他生闷气与朝事无关，才不追究。宋讷非常奇怪地问太祖怎么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宋讷几被惊倒。

就这样，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动辄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谓的“慎独”，哪里还敢有不臣之心呢？

第四，实行舆论控制，以建立他在人们意识中的崇高地位。

在时人看来，朱元璋的出身十分微贱，祖祖辈辈都是替地主干活的